

中东欧

赵司空

2017年关于东欧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四件事情值得关注：一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匈牙利的托马什·克劳斯（Tamás Krausz）教授撰文纪念。二是关于难民危机的进一步讨论，左翼内部也有着观点分歧。三是左翼的组织活动，以及左翼内部关于政党组织的不同观点。四是匈牙利欧尔班（Viktor Orbán）政府决定从公园里移走卢卡奇雕塑和关闭卢卡奇档案馆，匈牙利左翼呼吁国际社会发出抗议。除此之外，也有左翼学者分析了近年来的东欧民粹主义现象。

一、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201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但是这在东欧并不是一个被广为纪念的日子，用托马什·克劳斯的话说，在东欧对“十月革命”最流行的解释是“政变或暴动”，1989年之后的权力精英和资产阶级甚至害怕纪念十月革命。^①不过，作为苏联史专家，克劳斯教授对于“十月革命”有着他自己的看法。

^① Tamás Krausz, “One Hundred Years, One Hundred Messages”, in *Monthly Review*, online, (3) 2017.

首先，通过对俄国历史的分析，克劳斯认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基础。他从推翻沙皇谈起，指出1917年动摇俄国君主制和俄国社会的体制危机并不是突然爆发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就专制体制和“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达几年的热烈争论。1905年，“特殊性”浮出水面。那一年，无产阶级，尽管数量很少并且集中在城市，和数千万无地农民用占领土地的运动向全世界宣告沙皇独裁政体是依赖于他们而生存的。不论是残酷的恐怖，还是沙皇的“宪法”，甚至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未完成的土地改革都不能缓解独裁体制下的国内冲突和社会紧张，相反只能使事态进一步恶化。20世纪初，布尔什维克认为，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俄国不可能有西方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公民民主，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应该寻求与无地农民的“前现代”运动的“融合”。孟什维克则主张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合作，主张全俄制宪会议（All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而不是与“保守农民”合作。而事实上，“十月革命”得到了不同阶层的支持，因为它以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迎合了不同阶层的需求。革命阵营中人数最多的阶层是公社农民（Obshchina peasantry），他们更牢固地扎根于过去，是寻求土地再分配的“保守的”革命力量，持有反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传统。另一个革命力量是军人，他们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农民的后裔，但却是富有“旅行经验的”，是一群仍然武装着但却在等待被解除武装的士兵，他们的利益再次有效地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表达和代表。克劳斯说，这么多运动都能将这场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并且在国内战争中支持它，这不是巧合。俄国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也站在革命一边或被它所吸引，直到国内战争时的困难将他们推向统治阶级一边，最终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到西欧和其他国家。当时工人和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文化，而是那个时代的标语所表达的，“土地、面包和自由”，“打倒资本主义，所有权力归苏维埃！”等。

其次，“十月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克劳斯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被马克思本人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信中所预言。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如果俄国革命不是孤立的，如果西方劳动运动将摆脱资本主义秩序的束缚，那么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就将得到保证。如果俄国革命是孤立的，那么根据最初的共产主义目标，那么它就注定失败。在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地方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关联并抓住了俄国村社和俄国革命机会的重

要性。克劳斯引用了这段话，“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吗？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克劳斯说，这就是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地方，不过俄国革命没有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路线走。甚至在 1905 年革命之前，列宁就意识到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列宁以马克思为基础，预见俄国革命将成为整个欧洲革命的爆发点。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承认农村公社已经不可救药地对资本主义“妥协了”，同时，西方又没有为俄国革命提供可供追随的模式。列宁的“文明突破”的革命选择在“一战”中找到了它最终的概念和理论模型。他在帝国主义阶段总结出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这个背景下，他将俄国称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将俄国打造成破坏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最佳和最容易的场所。他相信全球竞争和资本积累的真正“受害者”将形成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抵抗”的基础，将和反殖民的“民主的、民族独立运动”结成联盟。列宁以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甚至是当时左派主流观点的方式，寻找着全球抵抗的可能性。

再次，列宁不是暴动者，“十月革命”不是暴动。克劳斯指出，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将巴黎公社看作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的和自然的“先驱”。通过学习资产阶级国家的著作，列宁总结出，在俄国，大量的贫穷和剥削使得不可能实践自由主义民主所提出的合法方案，因为贫穷和剥削阻碍了大多数人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机会。国家与解放被解释为两个相左的概念，它们的冲突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列宁在此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的建立要取消国家概念，代之以共同体（community）概念，最后列宁选择了法语的 *communa*。创建社会主义公社被看作是革命的实质和目的。革命同时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行动。革命如何能够被看作是暴动呢？“的确，一场真正的革命和暴动是相互排斥的理念，因为后者是指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为了权力的斗争。”^② 克劳斯接着分析，1917 年的形势并不是自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1 页。

② Tamás Krausz, “One Hundred Years, One Hundred Messages”, in *Monthly Review*, online, (3) 2017.

开始就明朗的，过了几年之后公民革命（civic revolution）是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过程中的唯一插曲这一事实才变得清晰。因为没有民主的资产阶级（democratic bourgeoisie），公民民主（civic democracy）是不可能的；而当时并没有这个条件。“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设置的目标完全相反，不是国家，而是苏维埃自治很快就开始枯萎了。

最后，“十月革命”的遗产仍然有意义。克劳斯认为，“十月革命”的遗产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它的“社会主义方面”，这个“社会主义方面”持续存在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证据便是苏联的人道主义文化，它从未隔断与“十月革命”的联系。这个方面对国际左派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这些构成了左派批判苏联发展、古拉格和官僚极权主义的扭曲体制的基础。从全球来看，俄国革命将下层人民的欲望从乌托邦变为了现实：消灭文盲、失业和极端社会不平等；引进免费教育和医疗；将妇女从中世纪压迫中解放出来等。这些基本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价值——社会解放、社会平等、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经济——仍然捕获着人们的想象。“十月革命作为历史经历，作为社会转向一种共同体的方法论，其存在超出了失败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验”。^①

当然，克劳斯也承认，所有这些都不应该转移革命之后的巨大困境，列宁曾经这样来描述：即便圣彼得大帝也用野蛮的手段清除野蛮的条件。那么有可能用不野蛮的手段来清除野蛮的条件吗？克劳斯说，他没有答案。但他确信，新革命的客观条件在全球体系的几个区域持续存在着，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并处于不同的成熟阶段，因此值得在其 100 周年时回顾 1917 年的世界一历史事件。

二、难民 / 移民问题讨论

波兰学者加文·雷（Gavin Rae）分析了公开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洛伐克左翼议员陆博什·布拉哈（L'uboš Blaha）关于移民的观点，表示赞同布拉哈争取工人权利的立场，但却批判他对待移民问题的保守主义态度。

加文·雷指出，布拉哈批评左翼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核心，允许国际资本剥削劳动。左翼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立场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城市知识分

① Tamás Krausz, “One Hundred Years, One Hundred Messages”, in *Monthly Review*, online, (3) 2017.

子，他们享受着可以在全球自由旅行的特权，他们更愿意在他们最喜爱的咖啡厅吃一块精致的蛋糕，然后出去与跨国资本作战。但与此同时，左翼却忽略了那些不能参与到这种特权活动并被束缚在传统社区和本地的工人阶级社区。在欧盟内，中东欧国家并没有被平等地纳入欧盟，而是通过去工业化的过程，以及作为国际劳动分工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者、西欧产品的消费者、外包和投机的目的地被融入欧盟的。欧盟基金的流入和中东欧工人输出到西欧，尽管不充分，但都是重要的财富再分配。因此保守主义右翼，例如匈牙利的欧尔班和波兰的卡钦斯基（Kaczyński），以及这些国家的极右翼从这些不公正中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加文·雷赞同布拉哈对左翼的批评，即大部分左翼都离开了为工人权利而奋斗的战场。所谓的“新左翼”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至理名言，将自己限制在所谓的文化事务和生活方式的政治上。这在中东欧左翼中也长期存在，因为劳工运动、工会和“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都被削弱了。如果中东欧左翼要想重建自己，那么就必须将自己和工人阶级社区联结起来，为他们的物质需求提供解决办法。

但是，在加文·雷看来，尽管布拉哈表面上对部分左翼提出了唯物论的批判，但是他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却建立在非常理想主义的假设之上。首先，加文·雷承认中东欧的工人在西欧受到的不平等对待和剥削，但是他坚持捍卫劳动力而不仅是资本流动的权利，并认为紧缩和不能移民降低了生活水平和工人权利。其次，加文·雷表示赞成与作为国际资本主义和战争受害者的难民团结在一起，这些战争是被西方释放出来的。欧洲每个国家的左翼的义务就是敦促自己的政府为难民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促使欧盟对其做出协调的和人道主义的回应。再次，加文·雷指出，尽管布拉哈指责左翼将文化置于经济事务之上，但是他自己却辩解保护斯洛伐克的文化 and 价值是完全自然的。而且，布拉哈进而指出斯洛伐克想要容纳基督徒而非穆斯林难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分享相似的文化价值观，他还说，伊斯兰在妇女权利等问题上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并且认为这种观点，即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免受伊斯兰的威胁具有所谓进步的色彩。简言之，加文·雷赞同布拉哈争取工人权利，却反对他对难民所持的保守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以保护斯洛伐克的文化或价值观为借口，这种辩解被加文·雷看作是布拉哈自己所反对的右翼的观点，而不是左翼的观点。相反，在加文·雷看来，左翼就应该主张与难民的团结，敞开国门。加文·雷强调，当中东欧人在西欧国家日益成为民族偏见的受害者的同时，他们

也从欧盟内敞开的国界中获益匪浅。中东欧国家应该成为反对右翼民族主义转向的第一线，并且应该认识到他们也对难民危机负有责任。加文·雷说，资本主义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制造了分裂并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繁荣昌盛。“文化”和“价值观”的幌子是为了遮盖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左翼一定不能宣称代表宽容和多元的新自由主义者所诱惑，也不能与自认为为工人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说话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妥协。^①

的确，布拉哈反对指责斯洛伐克人具有伊斯兰恐惧症，他说，斯洛伐克人害怕的是“不受控的移民”（unregulated migration）^②，他说大约80%的斯洛伐克人都反对难民摊派，并为申根国边界不受控感到担忧。他认为这种担忧是理性的，是出于对不安全和真正风险的担忧，而不是植根于仇恨和排外的非理性担忧。布拉哈说，西欧花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形成文化多元主义，急于求成只会激起法西斯主义或右翼极端主义。他也认为，“保护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价值观是完全自然的事情。”^③ 布拉哈还指出，斯洛伐克人的一个基本争论就是，难民本身并不想去斯洛伐克，如果强迫他们去斯洛伐克，这也违反了他们的权利，制造了社会紧张，威胁到申根协定。斯洛伐克决定先容纳基督徒也往往被误解，布拉哈认为总理菲佐（Fico）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即天主教斯洛伐克更容易容纳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这不是因为文化战争，也不是因为宗教偏见，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布拉哈说，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比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更加保守一些，因为它建立在更加保守一些的中欧价值观基础之上。而且，来自国外的摊派使斯洛伐克社会感觉很不好，它可能损害亲欧洲的感情，强化保守主义反应。“政治一定也要考虑后果而不仅仅是空洞的姿态。”^④ 布拉哈申明，他们反对强行摊派，但接受任何理性的办法以加强团结和人道主义。他认为，帮助叙利亚人、非洲人和其他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将他们所有人都转移到欧洲来，而是将欧洲标准带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去，这应该是社会民主

① Gavin Rae, “Why the Lef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ust Support Refugees”, in *Left-East*, September 7, 2017. http://www.criticatoc.ro/lefteast/support-refugees/#_edn2.

② L' uboš Blaha, “In Defence of Slovak Social Democracy”, in *Social Europe*, 27 October, 2015. <https://www.socialeurop.eu/in-defence-of-slovak-social-democracy>.

③ L' uboš Blaha, “In Defence of Slovak Social Democracy”, in *Social Europe*, 27 October, 2015. <https://www.socialeurop.eu/in-defence-of-slovak-social-democracy>.

④ L' uboš Blaha, “In Defence of Slovak Social Democracy”, in *Social Europe*, 27 October, 2015. <https://www.socialeurop.eu/in-defence-of-slovak-social-democracy>.

主义者的现实规划。

由此可见，关于难民问题，东欧左翼内部也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或者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或者建立在不同的现实政治考虑之上。当不同的观点都认为应该保护工人自由流动的权利的时候，面对难民问题则有的趋向保守，有的则趋向开放。

三、巴尔干左翼联盟与左翼组织

巴尔干左翼联盟 (the League of the Balkan Left) 是巴尔干地区进步左翼力量的一个组织平台。根据斯洛文尼亚左翼组织“民主社会主义倡议”(The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IDS) 的创始人阿讷伊·科什卡 (Anej Korsika) 介绍，自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甚至共产党都宣称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the Yugoslav League of Communists) 的真正继承者，但在科什卡看来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继承者。在有些国家，例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些政党已经变成了典型的西方式社会民主党；在其他国家，例如米洛舍维奇时期的塞尔维亚，他们甚至拥有统治力量多年。不过，科什卡说，米洛舍维奇和他的社会党完全不同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还有的国家，这些政党过多且没有实际政权，因此被边缘化，对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最终，起作用的是社会民主党阵营，它就像现在西方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一样运作。换句话说，它最终寻求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方案。科什卡认为，在前南斯拉夫国家最终只剩下了两大阵营，即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而它们并不完全不同，至少在经济政策上是这样的。科什卡这样来描述，“保守主义提倡‘真实的’和恰当的新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则试图提出‘带有人面孔的新自由主义’。”^① 换言之，政治图景最终发展为资本的两面，它们具有或多或少连续的共同利益和经济政策以获得权力。

因此，科什卡指出，这一地区进步的左翼力量在自我建构时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力量统治着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是进步左翼力量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即如何突破大学校园的斗争而变

^① Anej Korsika, "Towards the League of the Balkan Left", in *transform!*, 08 Mar, 2017. <https://www.transform-network.net/en/publications/yearbook/overview/article/yearbook-2017/towards-the-league-of-the-balkan-left/>.

成真正的普遍斗争。科什卡举例斯洛文尼亚组建了左翼联盟并在斯洛文尼亚国民大会（Slovenian National Assembly）的90个议员中占有6个。其他的政党也被创建了，例如克罗地亚的工人前线（Radni ka Front）或马其顿的左翼（Leica）。在克罗地亚，许多进步的媒体倡议也被成功地实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区域门户网站 Bilten，它涵盖了整个巴尔干地区左翼批判视角的新闻。另一个重要组织也在克罗地亚，它是工人倡议与民主平台（BRID），致力于与工会的合作，在日常工人斗争中获得了许多具体经验。

基于这样的组织基础，科什卡提到，再次激活这一地区进步左翼力量的努力是建立巴尔干左翼联盟，它旨在将巴尔干地区的进步运动、公民社会倡议和政党联合起来。它的短期目标是建立一个交流平台为信息交换提供中介。他说，巴尔干左翼联盟的历史还非常短暂，2015年10月，在克罗地亚 Baška 召开的致力于区域合作事务的工作坊卢森堡基金会区域暑期班中第一次提出这一理念。当时提出的为了进一步交流而设立一种代表机制获得了广泛支持，接下来2016年2月在斯洛文尼亚的 Brežice 召开了小规模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致力于将 Baška 会议上通过的一般理念具体化，并且为参与代表的第一次集会做组织上的准备。目前，大约有16个不同的组织参与到建立这个巴尔干网络的活动中。每个组织至少有一位代表。有些是学生组织，例如斯洛文尼亚的 Iskra、马其顿的 Mugra，其他的主要集中于媒体工作，例如克罗地亚的 Bilten。也有的主要代表做工会和基层工人工作的，例如克罗地亚的 Brid。除此之外，塞尔维亚的左翼峰会（Left Summit）是许多不同组织的联合，而斯洛文尼亚的民主社会主义倡议则是一个政党，联合左翼的成员并且在斯洛文尼亚议会中占有席位。还有更加倾向于理论项目的代表，例如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山的代表。“总体来说，这些组织、重点和他们的发展状况反映了这一地区左翼力量的广泛发展。”^① 他们为更有力的区域合作和观点与经验交流提供了现实的起点。科什卡说，建立起持续和可靠的交流之后，下一步的中期目标就是开展共同的项目，进行合作与区域活动，例如反私有化的斗争、田野工作经验交流、运动协调等。

① Anej Korsika, “Towards the League of the Balkan Left”, in *transform!*, 08 Mar, 2017. <https://www.transform-network.net/en/publications/yearbook/overview/article/yearbook-2017/towards-the-league-of-the-balkan-left/>.

巴尔干地区的左翼青年致力于建立政党、组建巴尔干左翼联盟，而 G.M. 托马什 (G. M. Tamás) 则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托马什赞同左翼应该尝试用新的方法来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他说，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已经变得太强大了，因为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新的同盟，即社交媒体和各种公民社会平台。但是，“逃避权力斗争而保持我们的理论纯粹性和我们的好的良心不可行。”^①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议会体制的作用应该受到严肃的质疑。他认为真正的左翼应该以严肃的方式重回政治，而不是建立微政党去获得一千多的选票，尽管有时候左翼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建立政党的努力也是值得尊重的，但这太耗精力而且也不值得这么做。那么，左翼应该怎么做？托马什说他想要一种“旧式的政治” (an old kind of politics)^②。换句话说便是，尽管深入到最小的乡村去和农民讨论直接民主的价值很难、很枯燥，但这是不可回避的途径。“最基本的，如果你站在人民一边，你就应该首先和人民谈话，然后为人民做些什么。”^③ 托马什还指出，在现在的新环境下，改良和革命的老问题应该被再次讨论，而我不应该忘记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阶级敌人并没有改变很多。

由此可见，在关于组建政党参与议会选举这个问题上，左翼内部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四、反对移走卢卡奇雕塑和关闭卢卡奇档案馆

布达佩斯市政府继 2017 年决定从郊区 Szent István 公园移走卢卡奇雕塑之后，^④ 又决定关闭卢卡奇档案馆。^⑤ 卢卡奇档案馆位于多瑙河边的一幢老式公寓里面，是由卢卡奇生前居住的房子改建而成的。由于房子在卢卡奇去世

① Lukáš Likavčan, “G. M. Tamás: ‘We Must Return to Politics’”, in *Political Critique*, March 28,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opinion/2017/we-must-return-to-politics/>.

② Lukáš Likavčan, “G. M. Tamás: ‘We Must Return to Politics’”, in *Political Critique*, March 28,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opinion/2017/we-must-return-to-politics/>.

③ Lukáš Likavčan, “G. M. Tamás: ‘We Must Return to Politics’”, in *Political Critique*, March 28,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opinion/2017/we-must-return-to-politics/>.

④ <http://hungarianfreepress.com/2017/02/16/hungary-is-removing-statue-of-philosopher-georgy-georg-lukacs-he-was-marxist-and-jewish/>. Accessed on March 5, 2018.

⑤ <https://monthlyreview.org/press/save-the-georg-lukacs-archive/>.

后已经被政府收回，所以档案馆是从政府手中租借的这个地方。档案馆的主要部分用以陈设卢卡奇的著作、研究卢卡奇思想的著作，以及一些手稿。尽管匈牙利科学院院长说卢卡奇档案馆的文献将被安全地转移到匈牙利科学院存放，^① 但关闭档案馆的决定仍然在匈牙利及世界其他国家激起了强烈的抗议。

东欧左翼网站 LeftEast 发表关于归还卢卡奇雕塑和重开卢卡奇档案馆的请愿书，指出将卢卡奇雕塑移走的建议是由“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提出，而被由青民盟（Fidesz）控制的布达佩斯市议会所接受的，同时，匈牙利科学院决定关闭卢卡奇档案馆，这一行为至少部分地阻止了卢卡奇相关研究在匈牙利的再生，而档案馆的图书、手稿书信和文件将被放到匈牙利科学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资料将无法被更广大的公众所获取。^②

G. M. 托马什回顾了卢卡奇的学术与政治生涯，指出在今天的匈牙利，卢卡奇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因为他曾经是共产主义领导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是服务于卡达尔政权（Kádár régime）的宣传家。托马什说，西方人只知道自由主义的反共产主义，这是由诸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以及前极左翼人物，例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伊格纳齐奥·西隆（Ignazio Silone）、阿瑟·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反法西斯主义流亡者所创造出来的。1968年之后，这种反共产主义被东欧和中欧，以及俄国的异见者和地下人权组织所借用。但西方相对较少知道的是“白卫军”（White Guard）类型的反共产主义，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大陆流行，现在正在当代东欧和中欧，包括匈牙利成功地再生。这种反共产主义倾向于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是次等人（Untermensch）的暴动。对这些反共产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不是意味着太少的自由，而是意味着太多的自由，意味着平等的理念是反自然的罪。托马什说，正是这些反共产主义者要毁灭卢卡奇的雕塑，要将卢卡奇档案馆的藏物四散各地。托马什指出，卢卡奇档案馆由匈牙利科学院所有和管理，但匈牙利科学院太胆小以至于关于这件事什么也没有做。并且，卢卡奇是犹太

① <http://mta.hu/english/hungarian-academy-of-sciences-on-lukacs-archives-106301>.

② “Petition to Return the Lukács Statue and Reopen the Lukács Archives in Budapest”, in *LeftEast*, April 4, 2017. <http://www.criticatoc.ro/lefteast/petition-to-return-the-lukacs-statue-and-reopen-the-lukacs-archives-in-budapest/>.

人，尽管当前的政权没有公开宣布它的反犹太主义，但是将卢卡奇雕塑移走是其反犹动机的一部分。作为最伟大的现代人类诸革命的重要见证者的卢卡奇不能被类似欧尔班的政权所容忍。^①

LeftEast 发表的关于归还卢卡奇雕塑和重开卢卡奇档案馆的请愿书也指出，将卢卡奇雕塑移走和关闭卢卡奇档案馆与极权主义的欧尔班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该请愿书指出，自 2010 年当权以来，欧尔班政权公开指责自由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匈牙利国家而言是颠覆性的和有害的，将卢卡奇描述为“共产主义的谋杀犯”（communist murderer）和犹太“全球主义者”（globalist）知识分子，将他和他的理念描述为“与匈牙利精神不相容的”（alien to the Hungarian spirit）。这些说法形成了更广泛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②，这种文化斗争是从 1989 年体制变化之后开始形成的，但是在欧尔班政权下被加速了，呈现为一种新的并且危险的形式，例如攻击与政府利益不一致的独立的媒体机构、非政府组织，最近更是威胁要关闭中欧大学。“似乎很明显的是，东欧准边缘化的（semi-peripheral）资本主义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来管理了。”^③这就是为什么欧尔班政权企图关闭所有不同于它自己的其他选择，这种修正主义将匈牙利历史与当下隔绝开来，而请愿书尤其强调，当下却是匈牙利公民最需要不同选择的时候。

上面所提及的关闭中欧大学的事件，是 2017 年 3 月 28 日，由青民盟政府所支持的立法建议关闭中欧大学，针对此事件的抗议运动迅速蔓延。在抗议声中，这个立法建议仍然在 4 月 10 日由总统亚诺什·阿戴尔（Janos Ader）正式签署立法。在事件发生之初，G. M. 托马什以匈牙利语撰文发表于 *hvg.hu*^④。托马什说，欧尔班及其圈子将关闭每一个独立的实体，不论它是什么。继对文化机构的清洗之后，媒体保持中立或者腐败。托马什认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自

① G. M. Tamás, “The Never-Ending Lukács Debate”, i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March 6, 2017.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never-ending-lukacs-debate/#!>

② “Petition to Return the Lukács Statue and Reopen the Lukács Archives in Budapest”, in LeftEast, April 4, 2017. <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petition-to-return-the-lukacs-statue-and-reopen-the-lukacs-archives-in-budapest/>.

③ “Petition to Return the Lukács Statue and Reopen the Lukács Archives in Budapest”, in LeftEast, April 4, 2017. <http://www.criticatac.ro/lefteast/petition-to-return-the-lukacs-statue-and-reopen-the-lukacs-archives-in-budapest/>.

④ G. M. Tamás, “A Soros-ügy”, in *hvg.hu*, April 4, 2017. http://hvg.hu/itthon/20170404_tgm_sorosugy_ceu.

主性将是下一步受到打击的。^①

除了以上四点之外，波兰杂志《政治批判》(*Krytyka Polityczna*)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斯瓦沃密·斯拉克斯基(Sławomir Sierakowski)对东欧近年来凸显的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东欧的民粹主义不同于西方的民粹主义。他指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给人的印象是，东欧式的民粹主义正在覆盖西方，但是事实上，只有欧洲后共产主义的东方民粹主义在常规选举中打败了传统政党。他说，东欧15国中，7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掌权，2个加入了联合执政，3个成为主要的反对力量。东欧的民粹主义在重要的方面区别于西方的民粹主义。首先，东欧缺乏保护西方民主的制衡传统。在美国，特朗普不能忽视他不喜欢的司法决定，或者简单地控制法院。但是在波兰和匈牙利，领导人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其次，当西方民主已经超出了对物质安全的关切而拥抱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说的“后唯物论的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②时，东欧政治组织更容易在抽象的自由主义制度，例如言论自由或司法独立方面受到攻击。再次，东欧的公民社会并不比西方的弱，但更加关注慈善、宗教和休闲等领域而不是关注社会事务或政治。最后，东欧民粹主义的成功不仅植根于令人沮丧的选民的经济关切，在西欧似乎是这样的，而且也植根于选民的如下需要，即围绕一个领导人的话语而被组织起来。对大众阶级的选民而言，民粹主义满足了他们对某种共同体的渴望。对中产阶级而言，领导人帮助他们在反对那些被污蔑为下等人——不管是难民，堕落的精英还是法官——的过程中界定他们自己的身份。现在，10个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稳稳地确保了至少20%的选票，其中波兰和匈牙利超过40%。斯瓦沃密·斯拉克斯基问，如果波兰或匈牙利的政治证明更加类似于俄罗斯而不是法国的政治，那么欧盟的边界过度扩张了吗？这些国家可能属于俄罗斯而不是西欧吗？欧盟自身还能保存吗？他说希望不是这样，但也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东欧人自己能回答这些问题。^③

① G. M. Tamás, "The Soros Affair", in *LeftEast*, April 15, 2017. <http://www.criticatoc.ro/left-east/the-soros-affair/>.

② Video transcript of *Project Syndicate*.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video/2018/understanding-populism-in-eastern-europe/>.

③ Video transcript of *Project Syndicate*. 2017. <http://politicalcritique.org/video/2018/understanding-populism-in-eastern-europe/>.

可以预见，难民危机还将进一步加深欧洲的分裂，而左翼内部的分歧也可能进一步扩大，是追求跨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是优先考虑本国国内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主张议会斗争还是直接动员底层民众，这都是左翼的分歧点。而近年来在东欧兴起的右翼保守主义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反对自由民主主义，例如匈牙利欧尔班政府一方面要求移走卢卡奇雕塑和关闭卢卡奇档案馆，另一方面又要求关闭中欧大学这所由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基金于1991年创立的大学。托马斯教授肯定“十月革命”遗产的人道主义现实意义，但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遗产应用于处理难民危机呢？难民危机重新激活了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在保守主义日益兴起的同时，人们也在寻找着不同的替代性选择，而马克思主义也将成为其中一种。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